

慶祝創刊十周年論叢

十年回眸

劉青峰

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轉瞬十年了。驀然回首，酸甜甘苦，要說甚麼又似無從說起，這時，我最先想到的是，大約在《二十一世紀》剛出刊不久，楊振寧曾含蓄地問過：一本很好但只辦一兩年的刊物，比起一個水平稍遜但能堅持十年的刊物，哪一本更有價值？事實上，這正是我當時未曾言明的疑慮。在西方，歷史長達百年以上的學報、專刊、文化雜誌所在多有，近代中國則思潮澎湃，刊物也隨之潮起潮落，難逃短命。今天，創刊於非常時期的《二十一世紀》，居然能夠出刊整整十年，終於辦到了以之命名的世紀。



一 危機帶來的契機

1989年4月2日，觀濤和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之邀，由北京來中大，開始為期五個月的訪問研究。當時，說甚麼也不會想到，不到半個月就因胡耀邦先生逝世引發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更不可能意料

我們即將踏上人生另一段旅程。由春到夏，由夏到冬，中國和東歐形勢的驚濤駭浪和不同結局，牽動着世界、中國和香港億萬人心。從迷惑、悲憤、無奈到「今後我們能為中國做甚麼？」的思考，把我們和香港學界朋友緊緊聯繫在一起。當時，雖然各自生活經驗、學術、地域背景完全不同，卻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共識：持續十年的中國思想解放運動不應該、也不能隨「六四」事件而中斷。在一段時間內，哲學家勞思光（通常大家都尊稱他為勞公）、歷史系朋友郭少棠以及金耀基、方正、觀濤和我，曾多次討論是否可以籌建一個民間的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由於種種限制，終於沒有結果。

「六四」對觀濤和我個人來說，更是人到中年而面臨的一次不得已的重大選擇。彷彿成熟的樹木一夜間被颶風連根拔起，我們的生活被生硬地切斷了，民間文化事業、個人學術興趣，父母、子女、親朋好友、讀者、錯綜複雜的社會聯繫，一切一切，都已被阻隔在羅湖橋之北，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而我們到底何去何從，也一直到這年11月，才算有了眉目。11月23日上午，我們應約來到校長辦公室，會見以對光纖通訊有重大貢獻而著稱於世的高錕校長。在窗外盛開的洋紫荊花映襯下，空氣氣氛顯得特別雅靜、安寧。在一小時的會面中，談中國、談香港、談中大、談我們送給他的書，他始終興致勃勃。最後，他對我們說：「自由探索的精神最重要」，而他作為校長的目標之一，就是培養有自由思想的獨立知識份子。他還特別建議：「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可以考慮在中大多工作幾年。這裏的工作環境比較理想，具體安排可以同陳方正所長討論。」經反覆考慮，我們終於認為，留在中大工作是當時所有選擇中最佳的。

1989年的10月到12月，匈牙利、東德、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先後發生了轉換政體的巨變。就在12月20日羅馬尼亞政變成功前一天，方正在與觀濤和我午飯時說起：「昨晚我想了很多，今晨終於想通了。我們應該趁目前的時機，以中國文化研究所為依託，以大陸知識份子為對象，辦一個學術文化思想性刊物。」我們當然十分贊同，觀濤還說：「青峰是一個好編輯。」12月27日深夜，方正與耀基通過電話後，按捺不住興奮馬上打電話告訴我們，耀基也全力支持辦刊設想。1990年元旦，方正和耀基來我們第五苑宿舍吃午飯，吃我們事先包好的餃子，十分簡單，也十分北方。飯後，議論到四點多。正是在這一天，我們四人將前幾個月反覆醞釀，要創辦一項文化事業的構想，落實到創辦一份刊物上，同時作出幾項重要決定：陳方正擔任籌刊的召集人並起草正式報告；邀請英文系周英雄和經濟系王于漸兩位和我們一起作為刊物的共同發起人；我主持具體編輯工作；刊物暫名為《二十一世紀》。

可以說從二十世紀90年代的第一天起，《二十一世紀》創刊工作就如上箭之弦，緊繃起來了。1月10日，方正致函中國文化研究所各所務委員徵詢意見，又正式向所的撥款委員會提出辦刊建議和初步方案。同日，六位發起人在文化所的126會議室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將刊物定為雙月刊；18日晚，又在大學賓館開第二次會議，這次還邀請了香港三聯書店的「老總」董秀玉列席。在80年代民間文化熱潮中，董秀玉在《讀書》工作，包遵信推薦她為「走向未來叢書」編委，

我們因此相熟。她思想開明，熱心助人，也深受香港學界朋友信任。在《二十一世紀》創刊初期，她多次應邀列席編委會，提出不少實際建議。更重要的是，她還推薦了兩位熱心中國文化事業，並且與大陸學者有密切聯絡的年輕人來幫忙：即原來在三聯書店工作的吳江波和林道群。

1月16日吳江波即已來所工作，而林道群在他之前不久已應聘為研究所新近出版的《中國語文通訊》助理編輯，兼做《二十一世紀》的事務。兩位年輕人一到，很快就與我組成三人工作小組，馬上投入種種編輯和事務性工作。兩日後，江波興沖沖飛赴北京組稿。他乘興而往，十天後，敗興而歸，帶回來了本不該意外卻令人十分沮喪的消息。江波說，組稿極不順利。打了幾個電話，對方一聽是香港來人約見，就一口回絕，不見不見。在有限的接觸中，他了解到北京知識界形勢空前嚴峻，新規定說沒有上級批准，一律不准給海外和港台期刊投稿寫文章。這種情況，其實我們是早可以想像到的，所以壞消息並沒有太過影響創刊熱情。2月18日六位發起人開會，討論後一致同意，各種困難雖然不可避免，但創刊的事還一定要堅持下去。

二 風雲變幻的年代

這是在香港過的第一個早春，洋紫荊花尚未謝盡，細雨濃霧裏，中大山坡上又開滿了各色杜鵑花。這時，我會突然想起北京的春天，紫、白丁香花盛開，淡雅清香，燦爛中不失柔和。而眼前的細雨濃霧，從山下望去，應該是雲吧？可不，從文化研究所的停車場北望馬鞍山，不也是被山坳中升起的白雲纏繞嗎？創刊之初，刊名頗費思量。此前，1988年「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曾創辦「二十一世紀研究院」，並於1988年10月在成都召開了「中國學者展望二十一世紀研討會」，當時中文大學的陳方正、李弘祺、廖光生都有出席；1989年4月底5月初，又與北京「中國文化書院」、香港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學中文系合作在北京臥佛寺召開了「五四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因此，「二十一世紀」的名稱似乎有點敏感，可能不宜再用。但躊躇再三，卻又想不到其他恰當的名稱。最後，在1990年3月2日通函六位發起人，共提出：「思想與自由」、「新大陸」、「二十一世紀」、「新世紀」等四個刊名，請各位不記名投票表決，點算結果「二十一世紀」以最高分中選。這樣，《二十一世紀》就定了名。

同一天，還草擬了一份準備廣泛發給學術文化界朋友的信。這封信強調：「在一連串震撼世界的巨變中，八十年代已經結束，風雲變幻、充滿挑戰的九十年代已經來臨了。這關鍵的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命運」，因而有必要創辦一份刊物「集合海內外知識份子的力量，使大家通過學術、思想的交匯激發，為建設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而努力」。又說明刊物是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由獨立編委會全權負責編務，以「學術論著及思想文化討論為中心，以鮮明的思想性為特色，廣泛的現代文化與知識領域為背景，

目標在於促進全球華人學者、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的思想交流與共識」。這一份呼籲各地學術文化界朋友支持創辦新刊的信，宣示了六位發起人在辦刊緣由、宗旨、刊物特色等重要問題上的共識。

這年春夏之交，雨水特別多。我覺得香港的雨季，即使是下暴雨時，其實並不可怕；反而不曬、不悶、不單調，雲、雨、霧和天、地、海渾然一片，草木隨風雨節奏搖曳飄動，勃勃有生氣。1990年4月9日在大學賓館召開第四次編委會，決



定9月中旬出版新刊。兩天後，冒着連成一片的白花花風雨，方正開始了為期近四個星期的美國和澳洲之行，並不斷打電話回來，報告好消息。5月10日，仍然下着大雨，方正一回到香港，就興奮地大談此行經歷。5月22日在文化所126會議室開第五次編委會，方正報告在十一個城市旅行中，他見了近百位學者、學生、熱心人士，參加了六次為《二十一世紀》組織的座談會，獲得積極而熱烈的反應。方正此行和他回來後的討論，鼓舞了士氣也形成了兩項重大改進意見。本來，為了實際運作方便，只考慮在中大校內找同事出任編委；但《二十一世紀》既然被視為中國知識份子的「公器」，就不單純是一班人、一個機構的事業；所以編委會必須擴大，以求具有廣泛包容性和代表性，六位發起人改稱執行編委，編委名單則擴充到31人，這都是在那時基本確定的。第二，經過反覆討論，大家同意刊物內容應不包括文學創作，但應有文化藝術和科技的評論、特別是書評；同時能與大陸讀者見面固然極其重要，卻又不應在題材上自劃禁區，只要是認真的學術性討論而非時事性政治議論，即應容許。此外，編輯上應在「大眾文化」和「專家學術」之間取得平衡，避免兩者「合則俱傷」。

事實上，方正到芝加哥訪問時，聚集在那裏的一批學者就強烈建議擴大編委會。當時，李歐梵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他的風格和感召力吸引了劉再復、甘陽、李陀、黃子平、許子東、查建英、林基成等一批具有中國大陸背景的學人，號稱「芝加哥學派」。歐梵、再復、甘陽作為第一批編委，在討論新刊欄目、組稿和刊物特色等各方面都相當積極投入。當時，芝加哥的朋友們也曾來信對刊名提出疑問，我回信則強調：「我們是在大陸處於思想、理論探討低潮時期來辦刊的，要辦一個非學報性的學術文化刊物。也就是說，它應該在知識份子的純學術專業興趣外，能抓到知識份子共同關心的問題。」並進一步解釋說，「『二十一世紀』似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放眼未來可以不意味着趕潮流，而是立足於做紮紮實實的長遠的文化建設工作。」

刊物各欄目最早定下而且完全沒有疑義的是「百年中國」欄。因為大家都認為，是深入再反思中國近百年歷史的時候了，有必要將這一欄放在突出位置。由於要強調刊物的綜合性，「科技文化」和「景觀」欄也不可缺少，而理所當然地分別

1990年4、5月間，方正到美國、澳洲組稿。圖為在芝加哥時的一個座談會，左起劉再復、李陀、黃子平、李歐梵，右第一人為查建英。

由方正和觀濤負責。至於「人文天地」、「經濟與社會」和「讀書：評論與思考」、「批評與回應」等幾個欄目也很快就定下來。而體現刊物的思想性、論爭性和主要話題的首欄，則經過反覆討論，最後定為「展望二十一世紀」。到7月中旬，創刊號目錄已大致確定下來，但編委普遍認為「學究氣太重」，仍在不斷調整。直到8月底9月初，正為尋找有特色的封面形象發愁時，方正意外發現計算機分形圖。也許，與我們三人早期學習科學技術背景有關，當看到電腦上變幻無窮、色彩斑斕的動態分形圖案時，三人都不能掩飾由衷的驚喜。就這樣，確定了封面圖案和刊標。不過，至今仍有不少朋友都認為這個封面太「科技化」，應該更換了。

方正起草的代發刊詞短文〈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是經過執行編委反覆討論和修改才一致同意通過的。這篇文章的題目，從1991年2月號起，就刊印在《二十一世紀》對開頁的顯要位置，成為本刊格言。記得，校樣中把這句話錯排成「為了中國文化的建設」，我趕快把「的」字勾回到「文化」的前面。這個小小「的」字的位置十分關鍵，切切不能錯。確實，「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最能揭櫫本刊宗旨。因為，它有足夠開放性，可以把所有以中文寫作的（包括不同學科、不同學派觀點以及翻譯的）學術論文、思想文化討論，都包涵在參與中國的文化建設這一概念之中。反過來，「中國文化的」作為一個詞組，卻已有比較固定的內涵。方正在發刊詞中強調中國的文化和思想探索不應該被政治事件中斷，本刊是公共的、開放的思想學術文化園地，不是「講堂」而是「咖啡館」，即充分表達了此意。

三 我們的編輯室

在我這個北方人看來，嶺南的秋天不像秋，9月中旬我為創刊號寫編後語時，天還熱得荒唐，太陽亮得使海面平靜、使山凝固、使美景失去生趣。10月3日，我在電視上看到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民眾在勃蘭登堡門前狂歡。第二天，是中秋節後的公眾假日，我已經在看第一期大樣了。10月中旬出版創刊號似乎指日可待。但是，我看大樣越看越心慌，錯字不少，字號也不好看，彩頁死板，根本過不了自己這一關。怎麼辦？10月6日我與方正通電話，提出很多工作必須推翻重做，他表示同意並迅速與耀基商量，一致認為新刊給讀者的印象非常重要，不能湊合。這樣，出刊時間就推遲到10月底。如果10月還出不了刊，所謂1990年創刊，就顯得很勉強了。但時間只剩20天，我們能行嗎？這是對編輯室的考驗。當時，方正的大姐因患晚期癌症正住院動大手術，江波在美國讀書的妹妹也因嚴重車禍住院，相比之下我的感冒發燒不值一提。

每當工作緊張之時，江波走路的姿勢與平時就不一樣。他的兩隻胳膊如同提重物似的，端在肩上、架在身旁，不停地登登登在辦公室間行來走去。而書卷氣很重的道群，也一掃平時夢遊神情，緊張工作。剛由中大出版社轉到編輯室才半個月的出版助理張素芬，馬上忙碌起來。此後，她一直以當家人才有的主動精

神，不論是製作版面、看菲林，跑印刷廠，還是控制和監督出刊周期，她永遠是質量第一，毫不放鬆，永不知倦。即使是在業餘行山、吃飯，甚至披上婚紗登記結婚、拍照時，她也事事操心、指揮若定。

10月16日，高校長又約觀濤和我談了一小時，頗為關切《二十一世紀》的出版。10月18日，編輯室同仁加班到夜晚11點多，第二天雜誌再次送廠。

10月27日，天氣十分晴和，我上班見到江波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能拿到嗎？」中午，方正、觀濤、我和江波、道群一起午飯，飯後又買了香檳。一回到辦公室就蜂擁去拿剛剛送來的雜誌，人手一本，迫不急待地翻看。個個嘴上都在說，這不好、那有問題，就像相媳婦挑鼻子挑眼，心裏卻說：不錯，就是這個了。記得，當時幾人對尊子為「展望二十一世紀」欄許倬雲、高錕、張灝、李亦園、金耀基、傅偉勳等六位學者的漫畫頭像，讚口不絕。

10月30日中午12點，在文化所的大門過廳，召開了慶祝《二十一世紀》創刊酒會。雖然只是臨時通知，大學和本所還是有近百人前來道賀。高錕校長和方正一齊打開大香檳，隨着「澎」的一聲，響起一片歡呼。這「澎」的一聲，正如起跑信號槍聲，我和編輯室同仁一齊踏出起跑線，一圈又一圈，一期又一期，不停頓地，一跑就足足十年。

創刊初期，有位朋友給我的信中說：「替你們累得慌。編一本雜誌就是在飯館中擔任洗碗工作，做菜的樂趣不多，但洗碗的勞累太可怕。好多人就是在編



1990年10月27日，創刊號出版，（左起）金觀濤、劉青峰、吳江波、陳方正一起翻閱評點刊物。



1990年10月30日中午在文化研究所召開慶祝創刊號出版的酒會上，高錕校長（右）與陳方正同開香檳慶賀。

多位朋友和編委參加了1990年10月30日慶祝創刊號出版的酒會，圖中左起第一人順序為陳其南、吳江波、高錕校長、林道群、周英雄。



務中老去。」今天，重讀這封信，不能不感慨繫之。倒不僅是感慨在編務中老去，更多的是「我怎麼可以做得下來呢？」方正曾開玩笑形容我這個人「沒結構」，指我為人處事太直接，沒有層次。確實，來港之前，在大陸那樣人事複雜的環境，我的個性決定了我不可能當甚麼負責人之類的。然而，在香港，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我做了，而一做就是十年有餘。不能不說，這是因為我的工作環境和同事都變了。

中文大學依山而建，又被平靜的吐露港海灣環繞，風景絕佳。而中國文化研究所則位於校區中心，周圍花樹扶疏，更是得天獨厚。穿過西式混凝土建築物大門廳，就到了中式庭園，上有天井，中有魚池。很難想像有比這裏更好的工作環境。但是，在這裏工作最令人愉快的，還不是風景之佳，而是沒有甚麼人事內耗。研究所是由多個大小不同、業務各異的單位組成的，但各單位雖然雞犬相聞，相涉卻不多，各自埋頭苦幹，自求發展。與我們關係密切、幫助也最大的，無疑是研究所的電腦技術員李潔兒和何潔鈴。不論是設計各類管理程式，解決電腦大小技術問題，還是緊張時的幫忙，都離不開她們。李潔兒的辦公桌就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辦公室，接觸自然更多。她學甚麼會甚麼，活潑大

在《二十一世紀》編輯辦公室中，左起李潔兒、張素芬、邱玉明、余國良、林立偉、何潔鈴、關小春。



方，衣着入時，工作能力極強，無論多麼潦草的稿件，多麼複雜的電腦技術問題，到她手裏都能迎刃而解，做得無可挑剔。

與張素芬差不多，邱玉明也是在1990年10月前後參加編輯室工作的，十年來她不厭其煩地處理了不知多少辦公室瑣碎事務。除了她倆是從創刊起至今一直在編輯室工作外，在頭兩三年間，編輯室人員流動很快。1991年7月，擔任文稿輸入和外務的陳進華考入了神學院，是第一個離開我們的年輕人。他活潑清秀，善於溝通，愛畫漫畫並寫

幾句俏皮話送給同事。進華離開不久，擔當編輯助理的岑淑群被浸會大學英文系錄取，上學去了。在他們之後，范頌基、黎美霞、鄭靜霞、黎群嬌、吳麗琮、蔡韶蘭等相繼接替了相應工作。刊物的第一位執行秘書范慕芬，我們叫她阿May，做事作風很「鬼妹」，成日笑嘻嘻，利利落落。當時，她除了管刊物的經銷、訂戶、讀者服務、版權、財務等大小事務外，還協助我籌辦1991年10月紀念胡適生辰百周年的國際研討會。1992年在她離開編輯室前，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建議我同她合組一個承辦會議的服務公司。接替阿May的是李瑞安，生得秀麗，辦事特別講原則。她和她先生都是周策縱的學生。因為1992年元旦起，道群即去就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新職，除了行政事務外，她還要兼助理編輯工作。同阿May一樣，她協助我籌辦了1992年的「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研討會。兩年後，她移民澳洲。

1993年夏，江波到美國讀研究院，余國良和林立偉先後加入編輯室；一年後，關小春接替了李瑞安的工作。國良工作一絲不苟，脾氣好，歌也唱得很好；任甚麼大小玩笑，他都微笑着說「沒甚麼」，被稱為「兄長」。阿偉平時沉默少語，卻酷愛運動，合氣道、騎馬樣樣都學，也因此年年輕傷。他對自己要求嚴格，校稿譯稿編稿，從不馬虎半點。比起阿May和瑞安，小春真是小妹妹，別看她表面弱不禁風，卻是個足球迷，初來乍到就獨立處理大小事務，井井有條。可以說，從這三位年輕同事加入編輯室起，雜誌的各項工作才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有秩序的階段，很少再出現江波在時的那種挑燈夜戰的趕工加班情況。

觀濤和我就這樣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下來了。轉眼就到了1994年，元旦過後上班第一天，我用剛剛學講的廣東話問同事「94年好」，惹得哄堂大笑，因為我的發音是「狗屎年好」。不管發音「歪」到何種可笑程度，我開始用廣東話打電話、購物並與同事交談。我的身體素來不甚強健，有一兩年間還周期性地發高燒。每次我生病，我的同事都很記掛我。1998年秋我去北京住院動手術，這一幫同事在給我慰問卡中寫道：「青峰大隊長，早點返來啊！」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想到



編輯室同仁在慶祝建所三十周年（1997年11月1日）酒會上，左起余國良、關小春、張素芬、蔡韶蘭、邱玉明、劉青峰、林立偉。

這個稱呼的，太恰切了。多年來，他們與我一起，除編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外，還組織了兩個頗具規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與中大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近20種書籍，協力完成文化所多項出版工作。我和這些年輕同事朝夕相處，工作很緊張，他們從不抱怨，十分和諧愉快。工作之餘，他們約觀濤和我去吃黃珍珍泰國菜、西貢海鮮、深井燒鵝，遊長洲，行山。最難忘的，是1992年2月，由張素芬提議和組織，在我們中大宿舍為觀濤過45歲生日。他們故意選了一支吹不熄的電池蠟燭，看到「老金」拼命吹也吹不滅，惹來笑聲一片。只要想到與編輯室年輕同事甘苦與共的往事，我總覺得有說不完的話和一份埋在心底的慰藉。

四 來自各方面的支持

如果說，十年來我從來沒有因為疲勞而厭倦編輯生涯、甚至曾想擺脫這份刊物，那不是真話，也不敢說刊物是否達到了創辦時的理想和目標，但只要想到十年來從未間斷地出刊，我就覺得很幸運。因為，在1989年觀濤與我被迫滯留香港的最初一年，我就找到了非常有意義和吸引力的工作。特別是想到絕大多數流亡者的命運，我不能不珍惜這一機會。然而，從一開始，我就感到憑我的學識，其實很難勝任這樣高層次的學術文化刊物主編之職。編輯文字還可以，但事實上我還要策劃、判斷文章水準，維持刊物質量，統理大小事務。幸而有學科背景強大的眾多編委一直熱情鼓勵我。編委會是不定期召開的，負責審查是否落實辦刊宗旨、討論重要選題並決定各種大事。而定期召開的編輯室會議，則認真討論每一期的內容、編排乃至標題，集體議定其最後面貌。雖然由於本刊性質所限，沒有實行學報類的匿名審稿制度，但從創刊起，編輯室就有完善的稿件管理和嚴肅認真的審稿制度。我就是在那種形式的制度下編輯雜誌的。所以，可以說《二十一世紀》真正是集體而非個人的事業。

編委會成員散布世界各地，平時接觸最多的自然是校內編委。他們之中，勞公對中外學術文化有敏銳洞察和哲學分析，除了開會和在新亞書院「雲起軒」

編委和朋友共慶創刊五周年，(左起)楊綱凱副校長、劉再復、陳方正、鄭樹森、劉述先；前方背影為金觀濤、石元康。



一號飯桌常常見面外，他還常到觀濤和我的辦公室聊天傾談，使我們獲益良多。哲學家劉述先對自己的文化理想有一份堅持，卻不妨礙與觀濤和我坦率交流。在雲起軒吃麵，我才知道他是參加過世界大賽的橋牌高手；秋季還可以聽他繪聲繪影地講在北角新光戲院聽地方戲。周英雄、陳其南和翁松燃都是台灣籍人。英雄從事比較文學教學和研究，平時總是皺眉頭，說話不緊不慢，創刊初期，組了不少文學



和文化方面的稿件。文化人類學者其南，則一副笑嘻嘻表情，愛用反問句機智地表達意見，主意頗多。松燃是政治學學者，教書之外，也是出名的時事評論家，對學問、對事、對人，從不忌直陳一己之見。王于漸離開中大到香港大學經濟系任教之後，1993年初增補了他的同事薛天棟以為替代。天棟木訥寡言，坐姿像軍人，為人卻極隨和。隨着香港社會變動，1993年起，其南、英雄、勞公先後到台灣出任教職；最近一兩年，天棟和述先、松燃也都去了台灣。有走的，也有來的。1993年，在大陸學界和出版界聯繫廣泛的劉小楓來到文化所任研究員，並成為執行編委。他參加審稿和編輯室工作會議，具體參與編刊工作。1999年增補的校內編委是政治學學者關信基。其實，我們經常參加大學服務中心組織的行山和遠足，所以與他早已相熟。有次到新娘潭遠足，他帶了一個大塑料袋，默默拾路邊垃圾，並追上隊友。他事事以身作則，卻不給別人施加任何壓力。

到大浪灣行山小憩，左為本刊編委關信基，右為大學服務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

中大的編委中，與觀濤和我關係最密切的，無疑是方正，其次是耀基。1987年4月，觀濤和我到哈佛大學做一個小型演講，正好在那裏訪問的陳方正來聽會。當晚，他帶我們參加了余英時和他事先安排好的一個飯局，雖然都是初次相識，卻一見如故，暢飲暢言，從此開始了互相信任的友好交往。中年人結交，或因業務往來，或在飯局杯酒閒聊，很難成為莫逆之交。觀濤和我被迫滯留香港之後，方正不但是我們的上司，也是共同開創《二十一世紀》事業的夥伴，還成為知己，實為難得。方正是老中大，曾先後在物理系任教，出任中大秘書長之職，轉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後，他成功推動幾項新的計劃，《二十一世紀》便是其中之一。方正辦事有決心，行政能力強，每做一事都力求精益求精。工作之外，觀濤和我也經常同他吃飯、行山、旅遊，交往其多，說話沒顧忌。也許因為是朋友，我與方正共事中，有時也會發生磨擦乃至激烈爭辯，而且這類衝突往往都是因不經意的瑣事引起。

與耀基第一次見面，是在1987年夏，觀濤和我返北京途經香港時，也是經方正介紹。第一次見面我就發現，耀基那生動、幽默和風趣的談話，只有「談笑



金耀基副校長(右)和劉小楓都是積極參與《二十一世紀》編輯事務的編委，圖為創刊五周年時二人在交談。

風生」四字差可形容。他那端着煙斗、睜大了眼睛、「哦哦」地點頭同意或反問時的姿態神情，也令人一見難忘。與耀基相處共事，與同他談話一樣令人愉快。時不時地，當他到文化所的會議室開會，在會前會後就順道來觀濤與我的辦公室小坐閒談，我們的煙灰缸，用得最多的正是耀基和勞公。以耀基在中外學術界的聲望、地位以及廣泛的社會聯繫，他既要處理校務，又要教書、研究，社會活動頻繁，卻仍然為《二十一世紀》寫了不少文章，並且十分積極地參與創刊和此後的每一件大事，實在難能可貴。

觀濤和我結識楊振寧，還是通過方正。1989年6月15日，楊先生約方正和我倆在沙田麗豪酒店午飯，那時他十分擔心外國可能聯合制裁中國，中斷改革開放。其後，他多次同我們議論中國和世界形勢、科學史和科技新發現，也談他見過的中國政要、相識的美國和世界科學家以及留學生，雖然觀點和評價不一定相同，但每一次交談都非常坦誠愉快。他對日期、地點、方位、重要對話和生動細節有不可思議的準確記憶，因此他的講話特別生動有趣。在最早議定《二十一世紀》編委名單時，方正也曾邀請了楊先生加入，但他並沒有立即同意，卻為創刊號撰寫了〈二十世紀的物理學〉一文。其後，他一直是雜誌最重要的作者，先後共發表七篇文章，被廣泛引用和轉載。作為編輯，我知道楊先生是如何認真地對待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插圖和每一句引文的。最近，我聽一位年輕朋友說，他們這一代學人有此議論的：「以前只知道楊振寧是大物理學家，通過《二十一世紀》，才知道他也是散文家。」直到1992年底，楊先生看刊物辦得認真



楊振寧先生到觀濤和我的辦公室。



寄寓法國二十餘年的司徒立(右)與巴黎眾多著名畫家和藝術家有密切交往，圖為司徒立和當代攝影大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才同意出任本刊編委，1993年由他推薦加入編委會的著名科學家還有陳省身、王浩、李遠哲和徐立之。

「景觀」欄的文章和每期六面彩頁，始終是最令人操心的。好在創刊初期，方正的外甥梁其姿就把她在巴黎求學時認識的朋友司徒立推薦給《二十一世紀》。1991年3月1日中午，方正、觀濤和我約好了與他在尖沙咀九龍酒店大堂見面。一進門，一個頭髮灰白、塊頭大得不似廣東人的人站在那裏等候，這就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司徒立。一起午飯，給他剛剛出版不久的1991年2月號《二十一世紀》，上面刊登了他第一篇討論法國具象表現畫家的文章。司徒立是美食家，見到好吃的就胃口大開，搓着手說：「不客氣了。」說話也格外有神有趣。他講起話來，聲音響，動作大，七情上臉，品評人物從不怕極端。他有聲有色地講述自己1972年如何游泳七個小時偷渡來香港、三年後又遠赴巴黎學畫的冒險、曲折經歷。當天分手時的最後一句話是：「司徒，你應該算入夥了。」從此，開始了他與《二十一世紀》的不解之緣、與我們的友誼、與觀濤的藝術對話。司徒立1992年加入本刊編委並擔任執行編委，1993年他與我們，約好友高行健一起組織了當代藝術危機的討論。好熱鬧的司徒，長年閉門巴黎家中畫畫，靜極生動，年年來港，逼我們丟下工作，陪他開心。

無疑，司徒立是校外編委中能常見到的一位。其他編委，則往往要在會議上或他們路經香港時才有機會傾談。1991年2月，方正與觀濤和我同機前往夏威夷，參加在東西方中心召開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研討會。「六四」以後，這是第一次中國大陸、港台和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濟濟一堂。當時正值海灣戰爭，卻並沒有沖淡會議的學術和友好交流氣氛。由於與會的《二十一世紀》編委特別多，方正特別在金環酒家晚宴招待。除了文化所我們三位以外還有中大的勞公、劉述先，來自美國的余英時、林毓生、張灝、李歐梵、杜維明、李澤

1991年2月在夏威夷召開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研討會期間，右起第一人為林毓生，第二人為余英時、第四人為張灝。



厚、劉再復、甘陽，來自台灣的韋政通和杭之，最難得則是北京來的湯一介；此外，還請了刊物的朋友王元化、傅偉勳、董秀玉和石元康等。1993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的盛會上，又見到差不多同一批學界朋友，但此後則盛況不再。

我們與英時、毓生和張灝見面次數並不算多，但無論是會上論學、私下聊天，抑或是日常組稿往來，每想到大題目或有困難時，我總要找他們幫忙。英時的幾篇文章，如談二十世紀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世紀、知識份子的邊緣化、歷史上香港作為自由言論空間的作用等，見解犀利，反響極大。張灝和毓生的多篇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特別是毓生與孫隆基的爭論，至今仍不時為人說起。張灝兩年前來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出席編委會會議見面機會稍多。毓生很愛美食，特別對香港鹿鳴春的燒雞、鐵板鱒魚情有獨鍾。而每次一起去鹿鳴春，都少不了元康和杭之。杭之也是我們的朋友，觀濤和我兩次去台灣，他都熱情招待並介紹學術文化界的新朋友相識。長住台灣的韋政通，對大陸學人特別關心，創刊以來，他經常與我通信，談論刊物內容和質量。李亦園則是我們文化所的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常來香港開會，而我們去台灣時，他特意抽時間帶我們看台灣民間文化。許倬雲常來中大，有一段時間還在歷史系任課。有次，觀濤與我到他在中大的宿舍，他正伏案寫作，室內空空蕩蕩、幾無雜物，他說：「我要做的事太多，不能玩物喪志。」鄭樹森以前和現在都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也常常出席編委會會議。他對中外文學及相關刊物的了解，使我們大開眼界。

這些年來，先後有三位編委病逝。傅偉勳雖不是編委，但他最早熱心推動兩岸學術文化交往。1987年他帶我們到王浩先生紐約的家中，與一幫台灣文化人吃飯聊天。此後王浩與我常有通信來往，他為《二十一世紀》寫了好幾篇精彩文章。1993年初，我去信邀他當編委，他欣然同意。但兩年後，他就病逝了。1996年10月偉勳也病逝了，成為觀濤和我內心的永久傷痛。他在《二十一世紀》

1996年12月號上的〈佛學、西學與當代新儒家——宏觀的哲學考察〉，也就成為遺作。1993年秋天觀濤和我訪問日本，在一演講會後曾與王崧興匆匆見了一面，但並沒來得及與他聊天。比王浩稍晚，1995年秋王崧興以並不算大的年齡病逝，令大家感到黯然。我無緣見到去年剛病逝台北的編委邢慕寰先生，只知道他對台灣經濟結構調整和高速發展有特殊貢獻，而又是真正淡泊名利之士。英時和方正與他相熟，都寫了悼念他的短文發表。他身體一直不好，但仍為《二十一世紀》寫了兩篇高質量的經濟學論文。

《二十一世紀》編委中不少是有大陸背景的，其中湯一介、龐樸和李澤厚是「中國文化書院」的核心人物，厲以寧是改革開放中活躍的經濟學家，但他1992年辭去了編委之職；劉再復在新時期文學評論中影響很大，甘陽和劉小楓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的發起人；而觀濤和我則是「走向未來叢書」的主要創辦者。此外，學界的年輕朋友，如「走向未來叢書」編委劉東和許紀霖，在《二十一世紀》創刊不久就分別出任北京和上海的組稿聯絡員。還有我們在80年代學術文化熱潮中結識的很多學界朋友，分布在大陸和海外，他們大多是創刊的積極支持者和作者。1998年10月我去北京動血管病手術，並治療相當長一段時間，正好1999年初紀霖應邀來到文化所作研究員。這一年間，無論是「讀書」欄的擴大與改版，還是日常編務，紀霖都幫助很多。這一年10月，《二十一世紀》增加了六名編委，除紀霖外，還有長期支持刊物、立足日本政治法學學界的季衛東，中大政治系的關信基（有了這兩位政治和法學學者出任編委，刊物增加了「政治與法律」新欄目），主動、積極協辦「科技文化」、立足美國生物學界的饒毅，曾在1996-97年來研究所作了一年研究員的汪暉，1998年來香港城市大學工作的張隆溪。另外一個長期支持者是長住法國的陳彥，他為刊物採訪過多位歐洲著名學者和思想家。《二十一世紀》的支持者和朋友太多了，比如說，在創刊初期積極為刊物聯絡及組稿的胡音、顧昕、王小強等朋友，提起來就一大堆，但總又會掛一漏萬，說不周全。每每想到通過辦刊，我結識了這麼多朋友，經歷了這麼多事，共同推動《二十一世紀》這項公共的文化事業，點點滴滴都使我銘心難忘。



1999年春天，新編委季衛東（左一）和許紀霖（左二）、中大政治系教師、本刊作者吳國光（右二）與編輯室同仁在文化研究所外山坡杜鵑花叢前。

十分有意思的是，《二十一世紀》創刊初期的積極支持者劉擎，今年又與中國文化研究所走到一起來。今年7月中旬開通的「中國社會發展網」，劉擎現任該網頁中的《世紀中國》編輯。作為傳統印刷學術文化期刊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與正在顯示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學術文化網頁，兩者之間是否能夠形成良性互動關係，則正是新時代中的新課題。

五 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

在1990年11月7日的擴大編委會上，大家對第一期相當滿意。耀基說，他是在飛機上看的，所以看得特別仔細，比他的預期好得多。12月中旬出版了第二期，質量更有提高。當時及其後，香港和海外一些有影響力的報刊，如《信報》、《星島日報》、《明報月刊》、《東方日報》、《亞洲周刊》，美國的《世界日報》、新加坡《聯合早報》等，紛紛報導和評介這一新出現的刊物。這些評論注意到這是一份「側重思想性的刊物，但不以季刊學報的姿態出現」（《信報》，1990.10.27），稱道「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這本雜誌，擔起了文化探索、交流、建設的重任，是香港的驕傲」（《東方日報》，1991.3.28），更有稱「香港竟然出了這樣一本有思想、有知識、有文化、有藝術、有智慧、有遠見的綜合期刊。……也只有今日香港才能產生」（新加坡《聯合早報》，1991.7.7）。前蘇聯科學院狄留遜院士（L. Deliusin）在《今日亞洲和非洲》（莫斯科）撰寫評《二十一世紀》的長文〈探索新文化的形態〉（“In Search of the Pattern of a New Culture”）中說：「我們有理由希望，它正在對中國新文化的建設作出實質性貢獻，它的編者不再盲目崇拜民族傳統，他們開始了一個東西方文化間廣闊而自由的對話」（*Asia and Africa Today*, December 1991）。法國人所辦的歷史悠久的《中國新聞分析》出了專號評介《二十一世紀》：這個刊物「在香港出版不但表明香港知識份子日益重要，而且彰顯了香港作為大陸乃至整個『文化中國』的言論廣場這一地位」（*China News Analysis*, June 1992）。日本《留學生新聞》1997年6月1日報導刊物的影響：「（《二十一世紀》）以高度的學術性在海外華人、以及中國知識份子當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二十一世紀》的存在卻無疑使香港這座城市增加了思想的深度。」這些溢美之詞，恐怕難以視為客觀、嚴謹的評價，但其中相當部分，實在是表達驚訝和勉勵之意，這對我和刊內同仁以及許多編委，也起了很大鼓舞作用。

但對我和大多數編委來說，最令人高興的，則是大陸學界文化界的朋友能讀到並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文章，與海外交流溝通。當初，用國內朋友來信中的話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陸學術文化界是「一片死寂」；因此，「在現在的氣氛下，創辦這樣有分量的學術刊物，以昭示中國知識份子為國家命運之不懈努力，實在是及時」。刊物「所揭櫫的多元性格，令人激賞，更難得的是，在內容上也完全能表現這個宗旨」。他們也特別珍惜來之不易的《二十一世

對我和大多數編委來說，最令人高興的，是大陸學界文化界的朋友能讀到並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文章，與海外交流溝通。他們也特別珍惜來之不易的《二十一世紀》能在大陸流傳，「希望它從長計議，從學術和理性的角度出發，真正成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站得住腳的、能夠影響一代學人的一個權威性雜誌。」

紀》能在大陸流傳，建議應避免發敏感文章，調子再低一點，「希望它從長計議，從學術和理性的角度出發，真正成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站得住腳的、能夠影響一代學人的一個權威性雜誌。」1991年5月，刊物出版四期後，江波再次到北京、上海，廣泛接觸學術文化界朋友，徵求對雜誌的意見並組稿。他在總結報告中說，國內學者雖然暫時還不能暢所欲言，但始終不放棄反省，他們認為「人文精神正在喪失，知識份子責無旁貸」，「不應該或借口民間社會，或借口學術與政治無關，放棄了知識份子應有的責任心」，「《二十一世紀》應有自己的立場，應從關懷民族命運的高度出發，作為一種文化事業，長期努力。」這種期待和鞭策，是何等強烈，令江波在他的訪問記錄本上批了兩個大字：「震撼」。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在創刊之初就引起中外各方面，特別是大陸學界的高度關注，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學術爭鳴和文化討論的分量。例如，早期何炳棣的〈「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一文（1991年12月號總第8期），即引發了哲學教授杜維明、劉述先、傅偉勳及歷史學教授孫國棟等學者的回應，辯論十分激烈。接下來，何炳棣的〈原理〉和〈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其意義〉等文章是廣泛傳播的力作。何公身材高大，兩眼老虎有生氣，自言戰鬥力強，打一個“knock out”一個。他有的文章火氣委實太大，只好逐字逐句往來磋商，他也欣然同意修改。1992年4月號發表了上海復旦大學姜義華與余英時商榷的文章，就中國近代政治思潮中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評價問題提出不同意見，由是激發了余英時的回應以及多篇文章參與辯論。此時，恰逢90年代初由重思想轉為重學術的文化氛圍大轉向，而其背景則是「六四」之後知識份子對80年代啟蒙思潮和文化熱的反思，這一辯論在中文學界引起巨大反響是很自然的。

《二十一世紀》創刊以來，就有如何兼顧學術性和可讀性的問題。頭幾期出版後，非文科背景的編委和朋友都認為，所刊文章太長、太難讀，刊物面貌也不夠活潑吸引。於是，從第6期起增設了「隨筆·觀察」欄。十分有幸，在陳丹晨幫助下，約來了中國二十世紀兩位文壇泰斗冰心和巴金的隨筆散文。不久，從第9期起又增設旨在加強作者、讀者和編者溝通的「三邊互動」，由是令刊物更可讀。但影響刊物整體面貌和最重要的改進，則是將首欄「展望二十一世紀」改為「二十一世紀評論」。80、90年代之交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解體，民族主義和「市民社會」成為世界性的理論熱點，《二十一世紀》曾先後刊登近十篇討論中國近代「市民社會」、以及20餘篇「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會議文章選編。面對自由主義的空前勝利，於1992年4月號登出了華倫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反潮流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沒落〉，顯示在新形勢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方向。當時，也有像福山 (Francis Fukuyama) 這樣的學者，針對人類的未來提出了「歷史已經終結」的命題。1993年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提出「文明衝突」論時，恰逢開設「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的第一年。一發現亨氏論題，編輯室就立即加緊策劃。由於時間緊迫，只能請新上任的余國良翻譯。記得，他為了鎮定情緒，一邊嚼牛肉乾一邊翻譯文章。也來不及請外面的專家寫回應，只好由

《二十一世紀》在創刊之初就引起中外各方面，特別是大陸學界的高度關注，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學術爭鳴和文化討論的分量。但影響刊物整體面貌和最重要的改進，則是將首欄「展望二十一世紀」改為「二十一世紀評論」。

三個執行編委自己動筆。這樣，1993年10月號的「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及時刊出了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以及金觀濤、陳方正、劉小楓從不同角度的回應文章。緊接着，12月號又發表了許倬雲、何信全、劉述先三篇文章，繼續討論未來全球文化衝突。這組評論立即在中港台和日本、韓國引起極大而長遠的反響。這次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我們，我也就這樣開始一期期地策劃評論專題，拿到編輯室和編委會討論，徵詢意見和尋找作者。到1997年時，似乎已沒有多少人記得當年是十月革命80周年，而本刊則於這年10月號以「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反思」為題，登出中國、日本、法國等地中外學者撰寫的八篇文章。後來，不只一家中外報刊指出，《二十一世紀》是唯一以十月革命為專題討論的中文學術期刊。

第二個論辯高潮，出現在1994年8月號，是以留美年輕學者崔之元為主，談中國改革面臨的〈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這個選題是自從1991年起就成為本刊作者的王紹光熱心推薦的。我立即向崔之元等組稿，在編稿、定文章大小標題時提了不少意見，並約請不同觀點的學者參加討論。緊接着一連三期，刊出了季衛東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還是烏托邦？〉、卞悟的〈淮橘為枳 出局者迷〉和〈「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等多篇文章，或支持有關論點，或提出針鋒相對的駁議。這次討論，被視為90年代「新左派」正式在中國思想學術舞台亮相。一年後由趙毅衡談〈「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徐賁談〈第三世界批評〉在當代中國的處境、劉東談〈警惕人為的「洋涇浜」學風〉等多篇文章相繼發表，理論傾向和學風問題遂成為討論熱點。此外，卞悟所關注的中國和俄國的農民、農業問題，徐賁多篇談政治文化與知識份子，以及何清漣就現實經濟和社會問題等多篇文章，都各有其強烈社會關切，在國內外引起相當重視。這些本刊重要作者，也是9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活躍人士。還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的謝泳，1993年我收到他第一篇文稿時，他尚不為社會所知，現在，他也是中國文壇上十分活躍的人物了。

「百年中國」欄一直是本刊的重點，創刊以來發表了大量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受到讀者好評並在相關研究中被廣泛引用。而其中的文革研究報告，更特別惹人注目，成為刊物特色之一。這些文章對文革進行多角度、實錄式的透視。1996年文革三十年，再編輯兩期文革專號，邀請中、港、法、日、美等地學者撰文，展示「文革對世界的衝擊」的國際視野。同年，編輯室將有關論文結集成《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出版。1997年，又順勢推出「反右40年」專輯，還配合香港回歸對「香港現象」作了一番巡禮。其後，我們的視野轉移到國際問題上去。1998年春北約攻擊科索沃，中國駐南大使館被炸，引發中外知識界對人權與主權的新一輪反思和討論。1999年10月號「二十一世紀評論」中的三篇文章，評述了西方思想界在此問題上的分歧。近兩年，更多次組織民主和憲政的專題討論。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即，面對全球化問題，我們又先後發表了中、日、英、美等國學者的看法，其中，劍橋大學諾蘭(Peter Nolan)教授以大量數據

為基礎的分析，對國人的震撼尤猛。對二十一世紀的來臨，我們自然也未放過，1999年12月號「二十世紀評論」用「別了，二十世紀」為題，發表〈站在美好新世紀的門檻上〉、〈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世紀末的危機意識〉，以及〈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等四篇文章，回顧與展望中國在新舊世紀的發展和角色。今年又以「軸心文明與二十一世紀」為題，一連兩期發表了包括著名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 (Shmuel N. Eisenstadt) 在內的多位學者共九篇文章，從千年長時段來討論人類的文明史，特別是反思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關係。對於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來說，「千年」(millennium) 有重要的文化內涵和暗示，在進入新千年之際以千年為尺度，反思文明進程是理所當然的，所以艾氏就特別熱心支持這一選題，寄書寄材料寫文章。但是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編輯室花費了一年多時間策劃的這個專題，大陸學界卻普遍感到不理解。從這裏，恐怕也多少可以看到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隔閡吧。

其實，早已有多位朋友提醒我們，近兩年《二十一世紀》與大陸學術文化界有些「隔」，漸漸失去了創刊頭幾年的激情和銳氣。也許，問題主要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我離開中國大陸已達11年餘，不知不覺間失去了對大陸問題的現實感，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我也一直很困惑：我們企圖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專題討論來把握時代的公共話題，呈現多元社會中各種思想和價值的衝突，藉以克服專業樊籬，倡導批判意識，卻又希望達成某種共識，這是可能或者必要的嗎？也許，這不過是西斯弗斯式的行徑。在烏托邦解魅，意識形態和所有公共性已被解構，在以個人價值為核心的世界，也許只有個人選擇才被認為是本真的存在。在市場機制壓倒一切，似乎只有商業大眾文化才有生命力的二十一世紀，我們堅持《二十一世紀》創刊時的文化理想還有意義嗎？無論如何，我內心卻總又時時感到不甘。同時，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來，大陸有不少同類刊物創辦，如《中國文化》、《東方》、《學人》、《傳統與現代》、《戰略與管理》、《方法》、《開放時代》等等，辦刊者同我們一樣都有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貢獻一分力量的初衷，可見我們也並非那樣孤獨。近年來，這些刊物中有不少因為社會的制約而夭折了，令人歎息、惋惜並感慨不已。二十世紀以來，在面對現代化衝擊的中國，從來不缺乏有志於公共文化建設的理想主義者，但或因時局動盪，或為官方意識形態所不容，或因為經濟困乏、個人精力有限而難以為繼；有多少傑出的刊物繼生繼滅，中國的文化積累和思想探索亦因此若斷若續，雖說是不絕如縷，卻無從匯為洪流。在今後，中國的公共文化建設能擺脫上一世紀的這種歷史宿命嗎？其實這些困惑我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創刊時都已經意識到了。無論如何，我希望並相信，今後總會有一些人抱着同一希望和信心繼續走這一條路。在一個思想和社會參與意識退潮的時代，辦一個思想性學術雜誌，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場艱難的苦鬥。問題在於，如何看待這種苦鬥。事實上，正是對這種現實的抗拒，代表了不依賴於政治、大眾和市場的批判反思意識的成長和尊嚴之所在。

我們企圖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專題討論來把握時代的公共話題，呈現多元社會中各種思想和價值的衝突，藉以克服專業樊籬，倡導批判意識，卻又希望達成某種共識，這是可能或者必要的嗎？